

碧沙岗营建与运行考论

陈晶晶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1464

DOI:10.61369/SE.2025080005

摘 要： 作为纪念西北军阵亡将士的核心场所，1928年冯玉祥主导营建的碧沙岗公园以革命纪念为主，兼具纪念与娱乐休闲功能。碧沙岗公园的主体空间烈士祠、烈士墓塚等建筑、命名等，强化了北伐战争的历史记忆与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同时，与中央级别的公共纪念空间相较，碧沙岗作为地方性公共纪念空间，呈现出两重属性：一方面是强化西北军内部团结与认同的物质载体，呈现出国民革命纪念地方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三民主义”革命叙事的物质载体，是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初期建立的革命纪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碧沙岗公园营建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运营，揭示出国民政府在认同塑造过程中，“派系生存”始终并行的逻辑。

关 键 词： 郑州碧沙岗；冯玉祥；革命纪念；南京国民政府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Bishagang

Chen Jingj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1464

Abstract： As a core site commemorating the fallen soldiers of the Northwestern Army, Bishagang Park, construc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Feng Yuxiang in 1928, primarily served as a revolutionary memorial while also functioning as a space for recreation and leisure. The park's main structures, such as the Martyrs' Shrine and the Martyrs' Tombs, along with their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naming, reinforce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the spirit of sacrifice for the nation. Compared to national-level public memorial spaces, Bishagang, as a local public memorial space, exhibited dual attributes: on one hand, it served as a material carrier that strengthened the internal unity and identity of the Northwest Army, reflecting the localized aspect of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emori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functioned as a material of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forming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memorial system establishe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Political Tutelag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of Bishagang Park before the Anti Japanese War reveal that, throughou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the logic of "factional survival" persistently coexisted.

Keywords： Zhengzhou Bishagang; Feng Yuxiang; revolutionary commemoration;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1928年北伐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国家的统一。然而，军事胜利并非意味着政治权威业已树立。如何在“后北伐”时期强化认同、整合社会力量，成为国民政府巩固政权的核心理题。在此背景下，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营建被赋予了特殊使命——通过物质空间的改造与象征符号的植入，形塑民众对“党国”体制的认同，并将革命记忆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郑州碧沙岗公园的兴建正是这一实践过程的典型案例。作为地方实力派主持修建的公共空间，碧沙岗在革命记忆塑造与后期运作中既展现出西北军对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认同，同时，又显现出西北军维护、巩固自身派系利益的一面。

一、碧沙岗营建契机

碧沙岗是为纪念在北伐中牺牲的西北军将士而建的集公园、祠堂、墓地于一身的公共场所。1928年，它的筹建、落成，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息息相关，也离不开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的认

可与支持。

国民党在北伐结束后，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武力结束割据纷争局面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定秩序、塑造统治的权威。适时，新政权中的地方实力派，有西北军系、桂系、阎系、粤系，省区势力有川、贵、滇等。在北伐进程中，国民党为减少

项目信息：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25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一般项目“公共空间与革命纪念：北伐后郑州碧沙岗公园的营建与国民政府的政治文化建构”（25E148）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陈晶晶（1990.04-），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革命阻力而联合的各路军阀，在战事偃旗息鼓之后，亟待通过整合来消弭其原有的割据意识，增强其对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拱卫中央的向心力。国民党政权树立中央权威，需要在客观存在的割据现实中进行政治整合，构建“党国一体”的集体理念与记忆。

在军政－训政过渡之际，国民政府不乏运用公共空间，通过系列政治、领袖、革命等纪念与仪式，塑造公众记忆，强化军民的认同。1928年，国民党在庆祝国庆的前一天举办追祭先烈的活动，通过盛大的仪式，一方面塑造出先烈为国家牺牲，为三民主义牺牲的光辉形象，增强国民党政权内各方力量的团结性，另一方面也为彰显政权建立的来之不易。国民政府通过仪式、革命纪念，将国家与社会、地方与中央、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效勾连，在官、民之间塑造革命记忆，构建认同、树立权威。

地方实力派将公共空间与革命纪念相结合，则是利用公共空间潜在的教化功能，一方面将中央理念完成地方化改造，另一方面则可借此巩固自身地位、厚植资本，双方在形塑公众记忆层面，可谓“异旨同归”。在此背景下，融革命纪念、休憩娱乐于一体的碧沙岗公园的筹建，应运而生。

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进程中顺应时势，较早地涌入革命洪流。北伐之后，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从西北贫乏省份扩展至陕、豫、鲁三省。一方面通过北伐，冯玉祥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实力派，冯玉祥及其麾下将领思想深处固结的地盘意识根深蒂固，在革命高潮之后巩固革命既得成果，成为新政权里地方实力派不约而同的选择。角色的两重性，也就使得冯玉祥的行动显现出中央决策的践行者与维护西北军自身利益者的双重属性。在豫省交通枢纽城市郑州建设碧沙岗公园，就能体现出冯氏作为国民党政权中的地方实力派所具有的角色的双重属性。

1922年、1924–1926年西北军两次进驻豫省，北伐及训政初期，豫省第三次纳入西北军势力范围。巩固在豫地位，成为西北军壮大自身力量的必然选择，如北伐时期冯玉祥安慰受伤将士所言“不久即可入驻中原，苦尽甘来矣”^[1]。这话不仅是安慰受伤将士，也是西北军首领冯玉祥的心理写照，他曾言三省之中，因为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一省。河南何以在冯玉祥心中如此重要？这就需分析西北军势力范围的大致情况。在西北军的势力范围内，甘、陕等省本就贫乏，为筹措北伐进程中西北军军饷更至财力枯竭；山东虽也在北伐中成为西北军的地盘，但日军盘踞济南至1929年夏，省情复杂；河南作为新增地盘之一，对西北军而言，陇海与京汉铁路交汇点的战略枢纽地位与筹措军饷的可补充财源两点，都使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极为重视对河南的经营。

冯氏所言重视河南，不仅指西北军治下刷新河南省政，如在河南省政府全体委员与军警长官会议上指示：在开封修筑大营房，不使士兵占用学校、民房；训练政治人员，革除官僚恶习；修路与赶设平民医院等；开封中山公园、中山市场、革命纪念馆参观者不少，应另添设民族博物馆及国民革命纪念馆；对商民工人灌输公民常识等。冯玉祥这些刷新河南省政的指示与既有举措，一方面体现出党国体制下地方省份拱卫中央的向心力，另一

方面则是厚植西北军的资本。1928年郑州碧沙岗的营建也是此种经营之一。

二、碧沙岗公园营建过程中的空间构建

碧沙岗公园作为近代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型公共空间，打破了传统园林的私属性。在公园营建与运行层面，选址以黄土地寓意“碧血丹心，血殷黄沙”，还以交通便捷为主要考虑因素；建筑命名与祠堂内部展陈体现出地方公共空间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记忆的有机融合；运营主体虽因中原大战有所分化，但属于“革命记忆场域”的烈士祠与烈士墓塚的运营，始终由西北军将领承担。

1928年4月，已经被委任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认为革命渐告成功，应建一庄严伟大的建筑，祭祀烈士英魂并留下永久纪念。他吩咐军事管理局局长许骧云，在冯玉祥原十一师义地周遭购买白沙岗地皮，更名碧沙岗。^[2]此为碧沙岗公园筹建之始。

在择址之时，郑州近郊“白沙岗”能够脱颖而出，在当事人的描述中有两方面的原因。首要原因则是不占用百姓耕地。白沙岗长期风沙弥漫，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村民只能在岗上栽种树木防风固沙。其次，正如冯玉祥在陵园竣工后命名“碧沙岗”的本意，将士忠骨葬在风沙之地，有“碧海丹心，血殷黄沙”的豪迈壮烈之意。从碧沙岗的地理位置来看，首先，它处于豫陕甘国道南部，距离火车站亦不远，交通便捷，西北军与游客便于到达；其次，西北军官长多系安徽、河南籍，北伐时期在河南与北洋军阀激战伤亡士兵数万人，冯玉祥在交通便利之地扩建陆军十一师义地，埋葬为北伐牺牲的忠骨，修建碧沙岗三民主义烈士祠，不仅彰显冯玉祥爱护将士之情，也能以祭扫纪念之场，鼓舞士气，提升所属官兵的忠诚。碧沙岗被选择的四点原因中，象征意义与区位优势，无疑是其主要原因。

1928年8月下旬，碧沙岗即将竣工之时，冯玉祥与许骧云还商议碧沙岗的扩大与充实，如筹建烈士遗族学校、残废院等，后因中原大战中阎、冯大败，两人被通缉驱逐，扩充计划搁置。郑州警备司令兼任铁路运输司令的许骧云对第二集团下级军官介绍碧沙岗烈士陵园筹建经过，称冯玉祥对在北伐中阵亡的西北军将士久久不能忘怀，责令许氏建一埋葬烈士遗骨的陵园供人凭吊、纪念；在经费筹措方面，则由许骧云在铁路货运附加费中筹出20万元。

碧沙岗的布局属于休憩与革命纪念于一体的公共场所。碧沙岗落成后，冯玉祥携将领鹿钟麟等参观，《申报》报导该则消息，称碧沙岗由中山公园、三民主义烈士祠、阵亡官兵公葬地、官兵眷属公葬地，占地四顷，各军路过郑时，令其参观，以激发其革命情绪，冯玉祥戏称自己将来退休，就在祠内看书写字看坟，死后葬于阵亡官兵公葬地的一角。1930年调查显示，三民主义烈士祠内部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段是公园，以亭台屋宇、鸟兽花草布置，后端则是墓地，间植柳柏，“春秋假日，游履如云，诚为郑埠公共游憩胜地”。^[3]

从碧沙岗的建筑构造看，大门横匾是冯玉祥书写的“碧沙

岗”三字，进口树西式华表一座。三民主义烈士祠建筑恢弘，如北平宫廷形式，碧瓦黄砖，雕梁画栋，外部极金碧辉煌、灿烂夺目，华表与烈士祠等建筑物的华丽，都彰显出冯玉祥对西北军北伐阵亡将士的无上尊崇。碧沙岗尽管为地方营建的革命纪念空间，但并不失中央级别革命纪念空间的大气与恢弘。

在烈士祠布置与陈列方面，则呈现出兼具国民党三民主义宣示与西北军革命纪念二重属性，殿中北面，悬孙中山遗像。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遗像坐北朝南的布局，显示了国民党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西北军已故将领郑金声、胡景翼、孙岳等分悬南、东、西三面，遗像两侧有楹联颂扬其功，遗像下各置一横匾，精梳传略，殿内玻璃箱内陈列烈士遗物，血衣最多，大玻璃柜内则陈列有阵亡将士姓名与级别的泥金花边册，四周墙壁空白处挂着军政要人送的挽联。殿外大柱楹联更将其与黄花岗媲美。殿内遗像层级分明的布局，一方面体现出地方于中央如星拱月似的关系格局，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实力派向国民政府表示忠心的方式之一。殿外大柱楹联将西北军的革命纪念由地方性上升到国民党全局层面，并将郑州碧沙岗与广州黄花岗相联系，不仅体现出冯玉祥打造西北军名片的志向，也有勒石铭功的意涵蕴藏其中。

在碧沙岗的布局中，烈士祠之外，中山公园与其内部所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亭的命名，植入党义，潜移默化地对公众进行国民党党义的宣传。这构成了国民政府“训政”初期增强公众对国民党认同的诸多举措的一环。通观碧沙岗的建筑与布局，可发现国民党政权中维系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的地方实力派，在践行国民党党义与形塑公众社会记忆的过程中，显示出“拱卫中央”与“为己谋”的政治角色的双重性。

三、碧沙岗运营中的关系网络

碧沙岗尽管规模宏大，但中原大战前的筹建、运营及其后清明节致祭，始终由西北军自行承担。1930年中原大战前，碧沙岗有四十余名职工服役，每月六百四十余元的经费，由冯玉祥司令部逐月拨发。^[4]

1930年中原大战后，“反蒋”势力落败，冯玉祥所率领的西北军退出河南。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计划将碧沙岗改作他用，冯玉祥嘱咐宋哲元出面交涉，接洽刘峙。正如前述所言，碧沙岗虽然是西北军所建的安葬西北军阵亡将士之地，是地方性的革命纪

念空间，但无论是三民主义烈士祠还是中山公园都与国民政府认同塑造的主旨相合，这也是刘峙作为蒋介石嫡系成员，在执掌河南省政后改造碧沙岗问题上最终折中处理的原因。在碧沙岗运营经费停拨后，先是郑县公安局接手，缩编人员至14人，经费裁减至200元，后因经费困难，远近闻名的“月花园”转渐衰颓。其后，碧沙岗转由河南省建设厅管理，被划分为“河南烈士祠”与“河南省立模范林场”两部分。西北军的这一地方性革命纪念空间得以保留，每年清明节由值年的西北军原将领主导的致祭活动，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未曾中断。

碧沙岗的管理人员受局势变动影响较大。负责管理碧沙岗陵园的葛心田就因生存困境不得不向冯玉祥求助，最终解决方案是由河南省政府给予葛心田一个秘书处名目，并在碧沙岗所办理的农林学校处安排葛氏一个具体工作，按月发给薪金。1936年，冯玉祥为修缮碧沙岗烈士祠筹备经费一事，向综理原西北军相关事务、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邓哲熙发文，告知宋哲元、韩复榘表示愿意分别担负修缮费用以妥先烈英灵，交代邓仲芝接收这笔款项，转交郑州碧沙岗管理员吴青旺（管理员原为葛心田，因此人管理工作尚可，理财不善，故被取代）。^[5]无论是西北军自成一系之时还是中原大战后解体，碧沙岗革命纪念空间部分的经营与经费，始终由西北军及其解散后分布在国民政府不同级别、不同职位上的原西北军各高级将领承担。

作为地方实力派营建的革命纪念空间，碧沙岗以纪念在北伐中牺牲的西北军将士、提升西北军地位与影响力为主旨，地方色彩鲜明；同时，植入的中山、三民主义等政治符号及三民主义烈士祠中的布设等，又使其成为国民党宣扬“三民主义”与革命精神、凝聚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是国民政府将北伐军事胜利转化为“三民主义”革命叙事，重塑公众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时期，冯玉祥前往致祭之时，曾提及其对碧沙岗未完成的整个计划，即在祠堂左边建立华丽舒适的残废院，右边建立烈士遗族学校，培养烈士后裔。这些美好的设想最终因西北军中原大战之后的失势与经费不济，化为泡影。总体而言，碧沙岗的发展轨迹与冯玉祥、蒋介石二人的关系演变类同，危如累卵，但终能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共生。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2），1927年3月6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

[2] 《碧沙岗 革命军人埋骨之乡 郑州革命纪念建筑》，《京报》1928年8月21日，第3版。

[3] 《陇海全线调查》，出版信息不详，1932年出版，第165页。

[4] 《十九年度河南建设概况》，出版信息不详，第67页。

[5] 《复邓院长仲芝》（1936年6月2日），《冯在南京第一年》下卷，三户社1937年印行，第1006-1007页。